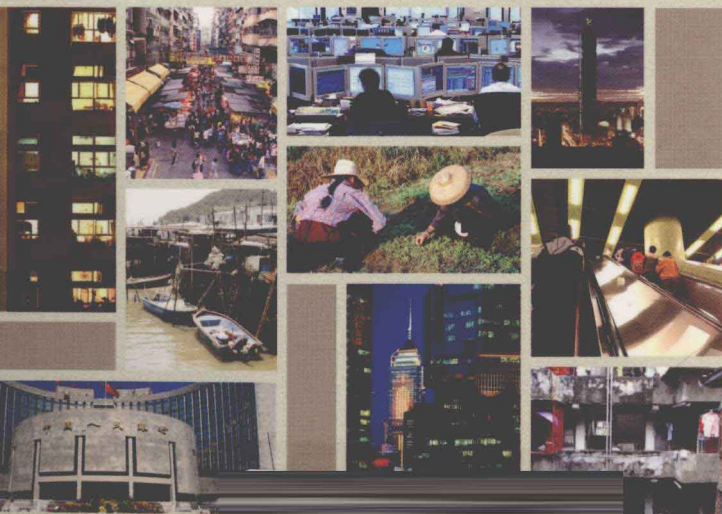


香港、台灣和中國內地的 社會階級變遷

劉兆佳 尹寶珊 李明堃 黃紹倫 編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香港、台灣和中國內地的 社會階級變遷

劉兆佳 尹寶珊

李明堃 黃紹倫

編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2004

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叢刊第六十一號

香港、台灣和中國內地的社會階級變遷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編者：劉兆佳、尹寶珊、李明堃、黃紹倫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地址：香港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印刷：傳真廣告印刷公司

版次：二零零四年七月第一版

國際書號：ISBN 962-441-561-7

© 香港中文大學 2004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香港、台灣和中國內地的 社會階級變遷

序

「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共產黨宣言》開宗明義如此說。

階級的存在，帶來社會不平等；社會不平等導致人際間、群體間、階層間，以至階級間的分化和矛盾，進而在特定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歷史條件下，激化為社會衝突。對階級問題進行研究，核心課題便是探討社會不平等，即利益和機遇的不平均、甚至不公平分配，以及解釋社會不平等如何形成、演變，以至掌握衝突和變動的規律，這一直是社會研究最為關心的課題之一。「社會學只有一個自變項，那就是階級」，Arthur Stinchcombe 這句話最能道出階級研究在分析社會現象時的相關性和重要性。階級研究早已超越了概念層次的爭論，落實到實證層面的探討；其研究範疇亦不斷擴展，突破了社會不平等、社會流動、工業衝突等傳統重點，將注意力延伸到政治發展、教育、家庭、文化和消費行為等眾多新課題。

在過去 20 年，全球化已構成一股難以抗拒的趨勢，席捲世界各地，影響力的幅度、深度與速度都是前所未見。全球化過程對國際間和個別社會內部的階層結構同時帶來深遠的影響，引起世界性的階層再分化，面對此嶄新的全球性社會關係變遷，任何社會和個人都發現不能置身其外。

香港、台灣和中國內地都經歷了令人觸目的社會、經濟發展，亦從亞洲金融風暴的打擊中體驗到全球化的威力。急劇的社經轉變帶動了分層機制的更替和社會結構的重整，傳統的社會階層（如資本家、小資產階級和勞工階級）與新興的社會群

體（如內地的中間階層、個體戶和私營企業主）在社經轉型過程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提出了迥異的訴求，既形成了新生的動力，亦衝擊到舊有的秩序。對於這些變化，兩岸三地的學者都不懈地進行實證研究，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便於 1999 年初成立「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開展大規模的社會調查，研究成果已列入國家「十五」重點出版項目。

從 1993 年起，我們每隔數年即舉辦一次華人社會階層研究研討會，提供機會讓兩岸三地的學者專家聚首一堂，交流彼此從事階級研究的經驗、心得和見解，促進華人社會階級研究的發展。首兩屆研討會分別於 1993 及 1999 年舉行，有關的論文已匯集成《發展與不平等：大陸與台灣之社會階層與流動》、*Inequalities and Development: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ese Societies* 及《市場、階級與政治：變遷中的華人社會》三書。本書承此傳統，收錄 2002 年 11 月假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的第三屆華人社會階層研究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共 22 篇。對於當前兩岸三地分層機制和階級結構的多個面向，此等論文提供了實證的數據和深入的分析。

香港特別行政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屬下的研究資助局（研究計劃項目編號：CUHK 4331/00H）、香港寶業集團主席劉尚儉先生、香港大學香港文化及社會研究計劃和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葉國華先生贊助第三屆華人社會階層研究研討會的經費，劉尚儉先生再慷慨資助本書的出版，我們對此深為感銘。香港亞太研究所的姚傳禮、葉天生、陳韻晴、梁月蓮和莫錦華協助研討會的籌備和論文文稿校對等工作，在此謹誌謝忱。

編者

2004 年 6 月

目錄

序	ix
---------	----

第一部 香港社會的階級變遷

階級之言：日常論述與階級身分

黃偉邦	3
-----------	---

後九七香港的政治失序：階級分析的角度

呂大樂、趙永佳	29
---------------	----

香港的社會分層模式與社會衝突的改變

蘇耀昌	61
-----------	----

從政策態度看香港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分化

王家英、尹寶珊	77
---------------	----

香港女性的社會流動趨勢

丁國輝	109
-----------	-----

族群與社會不平等：香港社會中一個隱蔽群體的生活遭遇

古學斌、陳錦華	129
---------------	-----

香港人對公民社會權利及社會責任的觀點：理想與現實

王卓祺、王家英	161
---------------	-----

第二部 台灣社會的階級變遷

半邊陲的發展：台灣企業在世界體系的鑲嵌

龔宜君、吳鯤魯..... 181

地位階層化與台灣的國營事業工人運動

何明修..... 203

台灣不同社會階級家庭子女教育取得的家庭效應

謝雨生、黃美玲..... 237

婚姻移民與國際勞動力移動：以台灣的越南新娘為例

王宏仁..... 271

全球與本地文化生活形態背後的階級現象：

台北與香港的比較

蕭新煌、尹寶珊..... 299

第三部 中國內地社會階級的形成

中華帝國晚期的國家、階級與抗爭政治：

一個初步的量化分析

孔誥烽..... 341

中國內地社會階層的主觀建構和客觀實在

王春光、李煒..... 371

中國內地各階層的社會公正觀：貢獻準則、功能主義

與自我服務傾向

石秀印..... 387

中國內地的社會分化機制形成與社會公正問題

陳光金..... 415

中國內地的社會政治變遷與教育機會不平等：家庭背景及
制度因素對教育獲得的影響（1940-2001）

李春玲..... 449

第四部 中國內地社會的階級變遷

中國內地的私營經濟和私營企業主階層：發展的實踐
和理論演變

陸學藝.....485

中國內地中間階層的社會定位探析

張宛麗、高鴿.....501

中國內地下崗職工的收入決定、階層認同與社會穩定：
遼寧四個資源枯竭性城市下崗職工生活狀況調查

張翼、李培林.....535

變化中的中國內地農民群體

冀維斌.....557

村落內部的階層關係：階層認同、合作和衝突的
案例分析和趨勢

樊平.....575

編者、作者簡介.....603

索引.....605

第一部

香港社會的階級變遷

階級之言：日常論述與階級身分

黃偉邦

前言

本文旨在探討由階級身分所衍生的概念及理論議題，以三種截然不同的理論框架展開討論，並討論「日常史」或「日常論述」帶給我們的啓示。在介紹此等理論所積累的研究經驗及實證結果之餘，本文更希望替這些理論拆開封條，討論每一種理論對階級身分的定義和假設會帶來怎樣的提問方向，其實證結果可以提供怎樣的回應和答案，以滿足其理論提出的問題。只有拆開這些理論的封條，才可達至本文的另一目的：為階級身分這概念提出嶄新的看法。

一

在有關階級身分及階級意識的社會學研究中，問卷調查佔很重要的席位，目的在於探求階級觀念是否構成社會身分、地位的重要線索或指標。例如 Marshall 的研究設計了很多方法來探討受訪者的階級身分意識，最常用的是詢問受訪者是否認為自己屬於某一個階級，如是，則屬哪一個階級。在詢問這問題之前，通常會問受訪者是否察覺到社會中的階級不平等、階級爭議，以及無處不在的階級層級，對此等現象有什麼看法。其次，為瞭解自我界定的階級身分所隱含的階級態度，調查會問及受訪者對個別階級的入場資格（如「你所說的中產階級包括

4 香港、台灣和中國內地的社會階級變遷

哪些人士？」）、參與階級性社會行動時的參照社群（如「你認為哪些人會跟你一樣投票給同一政黨？是否因為相同原因？」）等問題的看法。最後，為瞭解階級是否身分認定的重要線索，調查會問及受訪者是否認同社會上各個主要群體的理念。在這項研究中，有關階級身分意識的問題（包括核心及跟進的）共 16 條（Marshall et al., 1988:294-95）。

研究結果顯示，受訪者對社會中的階級分野及爭議有高度的意識，如他們大都把自己視作某一個階級的成員，認為階級差異非常牢固且無處不在；他們雖有多種界定階級成員的準則，但大多與職業和雇用條件有關（是以他們關心的是階級而不是地位問題）；除階級外，其他構成社會身分的線索並不多見於答案之中。根據這些結果，Marshall 等學者得出「受訪者的社會身分最主要由階級特徵構成」這個結論。

撇開這一連串調查問題是否已誘導受訪者預設了以階級作為思考框架的質疑（亦暫時對其他在訪問中的相關問題按下不表），這種研究方法衍生了以下幾個在理論上有待解決的疑團。第一，假如訪問過程是一場景，供受訪者談論與階級有關的議題，當他們說出對階級差異無處不在或階級爭議無可避免之時，可能只是重複曾聽過的公開討論（甚至公共論述），而這些討論本身亦是被局限在以階級作為框架的前提下進行的。因此，對階級具有極高的意識，充其量只能顯示受訪者對這些公開討論的認識，並不代表階級與他們是否有切身的關係。

第二，有論者指出，受訪者能認定自己屬於某一個階級，並不反映階級分野對他們的重要性。也有研究顯示，若被置於有明顯地位差別的社群組別時，受訪者亦會毫無困難地把自己區分為其中一組的成員（Brook et al., 1992）。這帶出兩方面的問題：我們若要求受訪者把自己區分為某一地位層級的成員時，所得到的回應，與要求他們區分自己屬何階級，有什麼分別？我們是否從而誘導受訪者講出心目中不同的層級組織圖呢？

第三，Marshall 等學者指出，受訪者對不同階級的進入準則，具有迥異的看法。受訪者認為職業和收入是界定工人階級及中產階級的重要指標，但對上層階級，則以社會地位為進入的準則，例如是否擁有世代相傳的爵銜？是否住在可供打獵、釣魚的郊外別墅？或更具體地說，是否曾接受精英式的英國公立學校教育？（Marshall et al., 1988:146）這些結果一方面支持了 Marshall 等學者的看法，即至少對工人階級及中產階級來說，判別階級的準則仍屬很「階級性」的職業與雇用條件；但另一方面，亦帶出了不同準則（視階級為政治現象者除外）共存的可能性，這可能以下述兩種情況出現：（一）受訪者認為大部分人都如自己一般，是「打工仔」、普通人，所以唯有以職業和聘用條件，把人區分為不同的等級；但上流社會或富商巨賈則屬於另一個世界的人，所以銜頭、生活模式等非階級性的特徵更為重要。（二）當問及受訪者有關工人階級及中產階級的特徵時，訪問者實際上把這些階級當作有共同特徵的共生群體，並要求受訪者從一大堆個人特徵中選擇。過程中並無著意（亦沒有要求受訪者著眼）於階級身分（作為共生群體的身分）是由社會聯繫構成的現實。這種研究手法到此為止只把階級身分視作一些階級性與非階級性的特徵的函數。但在發掘對階級身分的認知時，我們必須對受訪者的比較對象有起碼的認識，更重要的是他們是否認為其比較對象有跟他們相若的社會聯繫（請參閱本文下半部更深入的討論）。因此，問卷調查可能並非探討這類問題最奏效的研究工具。我認為，核心問題仍然是拆解階級身分的多種涵義，這是問卷調查方法未能充分解答的。

然而，對於問卷調查方法來說，最棘手的在於如何澄清階級身分與階級意識的關係。Marshall 承認兩者是截然不同的概念，但為什麼它們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他的研究發現，大部分受訪者認為社會衝突都是資源分配上的衝突，當中「很少是源於根深柢固的經濟制度，或與政治層面有明顯關係。」同

6 香港、台灣和中國內地的社會階級變遷

時，「特別要指出的是 他們很少視勞資糾紛為階級鬥爭，亦鮮有過問誰在操控工作場所的權力，只有三次訪談中有受訪者指出資本主義的問題。」（Marshall et al., 1988:152, 154）研究結果顯示，受訪者雖有清楚的階級身分，但同時缺乏可見的階級意識。Marshall 不禁提問：

這些結果不是很矛盾嗎？一方面，我們有很多證據證明英國社會普遍存在階級意識，同時階級亦是構成社會身分的普遍指標；但另一方面，我們似乎很難相信個人會把這些階級觀念轉化為一種群體意識，使他們為其他相同階級的人士爭取改善共同的發展空間。..... 有什麼可以解釋這種不一致的情況？換句話說，為什麼階級意識不能孕育出階級行動？（頁 156）

Wu（1996）從不同的角度，研究另一個截然不同的社會——台灣。他參考 Wright 的理論，總結出台灣的工人階級也是「有階級身分而沒有意識」的案例。他發現受訪者同樣有十分肯定的階級認同感，也同樣把自己區分為某一個階級的一分子，如四分之三的勞動工人和自雇工人自視為工人階級，但同時有一半從事服務業的非勞動工人，以及高達 42% 的中高層資產階級也自視為工人階級。然而，把自己標籤為工人的受訪者，不一定認為這標籤代表與其他群體敵對的利益關係。Wu（1996:101）據此指出，台灣的階級身分空洞如無物，並不代表什麼。換句話說，把自己認定為工人階級一員與反資本主義的價值或覺醒風馬牛不相干。Wu 的解釋是，台灣的工人階級一般被稱為「勞工」，這稱謂並沒有貶義。台灣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專為勞工而設的政策，包括勞工保險及置業借貸等，有助建立一個「談不上尊貴，但卻十分正面的工人階級形象。」（頁 101）因此，台灣工人階級的認同感是源於公共政策，而非勞資糾紛，而 Wu 亦以此解釋為何階級身分未能推動以階級為基礎的覺醒。

Marshall 等學者則提出了另一個解釋。階級身分未能推動

階級意識，是因為兩者是在截然不同的處境下呈現的。階級身分關乎意識和觀念，是認知性的；但階級覺醒涉及形勢評估，尤其是估量能達至社會制度根本變革的機會。英國的受訪者在面對經濟和政治議題時，鮮有提及資本主義；他們寧取金錢至上、功利為先的集體訴求，以保衛一己私利。他們評估後認為這是唯一可行的選擇。

這些解釋能否成立呢？在人們的思想汪洋中，認知性與評估性的行為根本不易分清；同時，所涉議題既很私人亦屬社會性的，所以要驗證這些解釋，是有一定的困難。就算暫且按下這些基本難題不表，以此方式處理階級身分和階級覺醒的理論亦帶來以下的問題。首先，兩者間的矛盾或許是言過其實。**Marshall** 亦持有相同的觀點，他援引 **Mann** (1970) 的「功利性服從」概念，認為在沒有可能出現另一種社會制度的情況下，工人集體地身體力行功利主義是理性的行為。但我認為，若不假設階級身分與階級覺醒之間有什麼必然的聯繫，兩者的不一致並無矛盾。事實上，兩者必然相關的假設，是建基於工人階級乃「歷史終極英雄」這一信念之上 (**Gould**, 1995)。但為什麼要像 **Wu** 那樣為階級覺醒和反資本主義的價值劃上等號？為什麼對階級身分的認知必須衍生某種使命？我稍後將會指出，研究階級身分的認同感必須瞭解這認同的不同層面（如腦海中的階級組織圖、比較對象的社會聯繫等），而非如問卷調查方法般，只專注於受訪者能否自我界定為某階級的成員，或是否意識到社會上存在階級分野或爭議等問題。

其次，階級身分和對政經議題的取態具有錯綜複雜的關係，是十分棘手的問題。**Marshall** 等學者亦明白，要證明個人所屬階級決定其對政經議題的取態（如認為社會太少公義、特權階級權力過大等），談何容易。正如他們所說，單憑階級分析是否就足以解釋這些取態？很明顯地，在階級和工作崗位以外，仍有無數的經驗和日常活動（如種族、性別、宗教背景等）影響著人們對周遭事物的立場和態度，這當然亦包括階級

覺醒。階級覺醒和行動也可以由非階級性的身分帶動，例如教育背景、家庭壓力、性別角色、政府行為、出生地和人際網絡等。因此，人們擁抱工人階級身分，絕不等於「認同某社會及文化地位，相反可能是一種對無產階級的逃避。」（Perry, 1996:3）Perry 認為東亞的工人階級可能關心「位置之爭」，多於發動階級鬥爭以謀求工人的集體福祉。

二

面對階級、階級身分和階級覺醒等命題時，社會歷史學家寧棄社會學家的結構或命定理論，而取 Thompson（1997）提出的文化轉向。Thompson 不認為階級有先天的共同取態和利益，認為不應假設工人必須徹底認同一系列可以客觀衡量的共同利益，才稱得上是「階級覺醒」（Gould, 1995）。因為工人階級也可以反客為主，在爭取甚或創造其共同利益的過程中，扮演主動的角色。因此，階級成為不斷演變而更新的事物，而非客觀可測的利益集結的結果（無論是否已達至）。這立場無疑是對 Manichean 學說的強烈反響，反對史學家和社會學家把英國的工人「誘導和推向非黑即白的政治立場，不是支持便是反對馬克思主義所預言，因資本主義的矛盾而引發的階級鬥爭。」（Somers, 1997:73）

上文曾討論階級身分和階級覺醒之間存在鴻溝，或階級意識未能孕育階級行動的問題，這可以視為 Gould 和 Somers 等史學家不斷提出的疑問的變奏，即「為什麼『真正的』工人階級無疾而終（或鬆散、各自為政、轉軟）？」（Somers, 1997:76）

Gould 和 Somers 為這個問題提供了不同的回應。對 Gould 來說，從 Thompson 取得靈感的新社會史觀，正視了工人階級如何建構其世界觀（這世界觀包羅萬有，是市場、性別、家居、時間等概念的混合體），對階級有較寬鬆的定義。階級按